

# 从俄国文学作品看俄国贵族家庭的结构与生活

王康名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学院,香港 999077)

**摘 要:** 从彼得大帝改革到 19 世纪的农奴制改革,俄国社会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文化的影响。尤其对于俄国社会中最容易接触西欧文化的俄国贵族来说,西欧思想更是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秩序。传统上,很多人认为俄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一个单纯接受西欧文化的过程,但在深入分析俄国贵族阶层的著名文学作品和家庭记录等一手材料中可以发现,俄国所特有的家庭模式仍然在 19 世纪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并且存在相对于西欧家庭模式先进之处。因此可以看出,俄国近代家庭秩序的变迁并不是单方面地接受西欧文化的过程,而是在本土独有的家庭文化和西欧家庭文化互相交融的结果下,一同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关键词:** 俄国;文化交流;贵族家庭;家庭结构;家庭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I5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6)02-0112-05

## Russian nobility's family life in imperial era: An investigation from Russian literature and family records of nobilities

WANG Kangming

(History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Since reform of Peter the Great to nineteen century's slavery reform, Russian society was inevitably infected by Western culture. For those nobilities, the regulations of their family structure were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Traditionally,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society was a unilateral adoption of Western Europe culture. Howev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and family records, it is figured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family culture still has its position on Russian daily life. What is more, compared to family order of Western Europe, Russian family order has its own advances (for instance, the inheritance rights of women). Therefor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family structure on imperial Russia period was a by-directional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rather than a unilateral culture invasion from Western Europe.

**Keywords:** Russia; culture interaction; nobility family life;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culture

---

收稿日期: 2015-10-10

作者简介: 王康名(1991— ),男,浙江省台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学及东欧与斯拉夫文化。

俄国自身具有较为深厚且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自彼得大帝以来,近代俄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开始不可避免地逐渐向来自西方的欧洲文明靠拢。相对于一般的俄国人,俄国的贵族群体更有条件接触来自西欧的文化,因此这个群体在俄国近代西欧化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描述贵族时就提到,俄国贵族家庭的孩子接受法国教师教育,在意大利歌剧院或法国餐馆学习,在圣彼得堡的画室展现才华,然后手拿着一卷伏尔泰的著作在莫斯科完成他的学业<sup>[1]</sup>。但是,并不是所有俄国人都能够坦然接受这种剧烈的文明转变。陶惠芬在其《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著作中就引述了几位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彼得改革的批判。谢尔巴托夫认为,彼得改革破坏了俄国的风尚,使贵族破产;卡拉母津(N. Karamzin)则痛心彼得让俄国人“不是俄国公民,而成了世界公民”<sup>[2]</sup>。有些学者认为,“俄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对于俄国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十分西方化与新兴的词汇。根据张建华的考证,俄国采用西欧通行的公爵(князь)、伯爵(граф)、男爵(барон)等贵族称号开始于彼得一世的改革,并在18世纪80年代的凯瑟琳大帝时期最终确定贵族为一个固定的阶级<sup>[3]</sup>。有些研究者如弗里兹(G. Freeze)更激进地指出,是目前西方化的历史叙事才让俄国本身有了“阶级”“贵族”这样的概念<sup>[4]</sup>。俄国贵族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俄国传统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西欧化的样本。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俄国近代改革中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欧的文明的冲突,笔者尝试把俄国贵族家庭作为叙述的主体,并通过考察贵族家庭的内部关系来窥视西欧思想在俄国改革中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说,近代俄国贵族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一个基本时间线是越接近帝俄晚期,自由平等的内部家庭关系越成为主流。米罗诺夫(B. N. Mironov)将这种转变称为“家庭内部关系由专制向民主过度”<sup>[5]264</sup>。一般来说,家庭的基础关系有两个: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因此,本研究从俄国贵族家庭的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两方面考察了近代俄国贵族家庭结构的变化。

## 1 近代俄国贵族家庭的夫妻关系

对于妻子与丈夫在家中的地位划分,妻子绝对服从于丈夫的思维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至少在帝俄时期这种思潮占据着主动,但是在俄国相对于西欧更加平等的夫妻财产制度及以叶卡捷琳娜为代表的西化改革的共同推动下,尽管充满阻碍,女权斗争还是在帝俄晚期开始持续发展。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出生于1758年的贵族小姐安娜·拉伯齐娜(A. E. Labzina)的回忆录中得到过更加露骨的描述。当安娜为母亲的病情而感到悲伤流泪时,他的新婚丈夫的反应是被她的眼泪激怒,并对安娜表示“现在你的爱应该全属于我,因此,除了取悦我,你什么都不应该去思考。你现在为我而活,而不是为其他人。”<sup>[6]374</sup>而她的母亲在去世前对于安娜可能遭遇到的困境的教诲是“如果他对你残忍,你需要忍耐并服从他。不要和周围的人抱怨,没有人会帮助你。你这样做只会暴露他的软弱并给你和他带来耻辱。”<sup>[6]373</sup>幸运的是,安娜由于丈夫的早逝,得以改嫁并在第二段婚姻时获得了幸福。这种妻子必须完全服从丈夫的思维至少在19世纪中期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1857年的俄国法律中仍然有条款要求妻子要将丈夫当成一家之主,并且对丈夫要做到爱他、尊敬他并且绝对服从他<sup>[7]309</sup>。东正教在俄国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更加固化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东正教对于妻子与丈夫关系的描述相对较为隐晦。东正教士为传统俄国宗法制家庭作的辩护是:尽管夫妻是平等的,但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是被上帝确定的,最适合妇女在家庭中的就是抚养孩子、管理家庭事务并且支持男人在外部的事业,而男人的角色就是在外为家庭提供物质支持<sup>[8]75-76</sup>。这种特定的角色划分从子女们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大部分父母会认为这极为重要。托多洛夫(J. Todorov)注意到,即使是思想进步如赫尔岑这样的作家,他在妻子去世后选择将儿子留在身边,而将女儿交给了一位女性朋友<sup>[9]16-17</sup>。当然,这种性别上的职能划分的特例也存在。近代俄国史上著名的女骑兵团军官度洛娃(N. A. Durova)就以女性的身份参加了拿破仑战争并最终晋升为骑兵团军官,但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里,她不只一次提到母亲是如何咒骂自己的“丑陋”并尝试改变她如男孩子一般的个性,所幸的是她的父亲对她表示了支持<sup>[6]354</sup>。

需要明确的是,俄国传统的贵族家庭中妇女的地位也并不是全无进步之处,相对于她们西方的同伴

们,她们的财产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对于俄国贵族妇女财产权的承认不仅仅限制于对于庄园(当时俄国贵族的主要财产,含农奴)的控制,俄国贵族妇女在庄园的交易及管理上也和贵族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sup>[7]329</sup>。而且这种情况随着时代的推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根据马雷斯(M. L. Marrese)的研究,在农奴解放前,俄国贵族妇女交易庄园(或者至少以妇女名义进行的庄园交易)在总的庄园交易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从 1710 年代的 5%,急剧上升到 1750 年代的 30%,并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达到了惊人的 43%<sup>[10]</sup>。随着俄国贵族妇女越来越多参与到庄园交易中,可以预见她们自身的独立性与见识也会随之增长,这将不可避免地让她们会对于从法律上不得不依附于丈夫的这种状况表示不满。

事实是,这种情况的确出现了。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一场关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大讨论被激化。这场讨论的原因,瓦格纳(W. G. Wagner)认为,激发这场大讨论的土壤一是来自西欧的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哲学传入;二是从叶卡捷琳娜时代开始普及的教育不仅仅加速了这种强调个人主义的思想的传播,并让个人能力而非家庭关系成为年轻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关键,因而造成了年轻人对传统宗法制的俄国家庭的依附减少<sup>[8]81-86</sup>。克里米亚战争后,在一些较为开放的知识分子如皮罗戈夫(N. Pirogov)等的呼吁下,妇女们(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开始要求拥有自己的事业,与丈夫的分离,并且开始结社<sup>[11]68-72</sup>。而对于俄国的贵族妇女们来说,她们相对于其他的俄国社会阶级更有学识与资本(法律上保障的财产独立权)来与自己的家庭作抗争。当然她们面临的直接阻力可能也更加严重,俄国当时的上流社会并不能够完全接受妇女彻底的颠覆。事实上,皮罗戈夫最初为了能够减少来自沙皇的阻力推广女权运动,他的宣传侧重于受过教育的女性能够更好地教育子女及帮助丈夫<sup>[11]70</sup>。亚历山大三世对于妇女的高等教育采取了消极态度,当时的教育部在 1886 年下令所有女子高等讲习所停止招收新生,进而导致莫斯科/喀山和基辅的女子高等讲习所关闭<sup>[12]</sup>。尽管如此,在关于俄国贵族妇女对于女性独立的追求程度方面,还是把贵族阶级塑造成了当时俄国女权运动的主力。根据瓦格纳的统计:在 1893 年,一共有 1 899 名妇女请求法院批准她们离婚,占请求离婚总人数的 88%<sup>[8]96</sup>;其中来自贵族、军官与政府官员家庭的妻子人数有 235 人,占请求离婚总人数 12%<sup>[8]96</sup>。这种占比看似不高,但是对比 1897 年俄国的世袭贵族与终身贵族(按照俄国当时的规则,军官与政府官员即使不是世袭贵族,大部分也拥有终身贵族的头衔,该头衔不传给子裔也不得领有土地)<sup>[5]71-86</sup>相加仅占俄国社会 1.5%的人口<sup>[5]118</sup>,可以看出俄国贵族妇女对于自身权利的重视与对婚姻的不满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俄国社会阶层的妇女。当然,这种斗争结果对女性来说并不总是美好的,托尔斯泰(L. Tolstoy)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A. Karenina)就更像是这种夫妻关系变化中的牺牲品。

## 2 近代俄国贵族家庭的亲子关系

相对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俄国贵族家庭中的亲子次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于帝俄早期的贵族家庭,家长对子女的统治是绝对的,直到日后的西方思想的传入,才使得这种现象有所缓解。这种控制本身从儿童时代就已开始。在屠格涅夫(I. S. Turgenev)的名著《贵族之家》中,拉夫烈茨基(F. I. Lavretsky)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要求是:

早晨四点钟他就得爬起来,马上给凉水一浇,于是就绕着一根高杆,抓住一条索子拼命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菜仅一看;他骑马,练习射箭;在每一个适宜的机会,他还得依照他父亲的榜样,锻炼意志的力量<sup>[13]177</sup>。

而这样的要求的结果,就是拉夫列茨基发现“多年来他不由自主地对父亲百依百顺;而当他终于看清楚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许多习惯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sup>[13]180</sup>。当然,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俄国贵族家庭的教育模式,但至少在对父亲百依百顺这一点上并没有夸大。有些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家庭关系。比如托尔斯泰的著作《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族对他们的子女的教育就相对开放很多。但是米罗诺夫认为,在当时大部分的贵族家庭应该处于比较严厉的家庭环境下,某些自传体性质的古典艺术作品对于贵族家庭自由的描述很可能是伪自传,是为了展现一个完美的贵族神话<sup>[5]259</sup>。而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托尔斯泰将他自身时代(19 世纪中叶)

的理想的教育理念带入到了小说人物中。

贵族家庭对子女的控制在其成年后也没有放松,这在贵族子女的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鉴于贵族家庭包办婚姻严重,彼得大帝在其早期的改革中明令禁止强制子女结婚;1702年的法令要求新婚夫妇必须在婚礼前有6周的适应期,如果双方无法接受对方,则婚姻无效;1722年的法令更加明确禁止强制婚姻,甚至农奴的婚姻自由权利也受到了保护<sup>[7]309</sup>。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往往还能够被他们的子女所接受。因为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俄国家庭来说,婚姻不仅仅是夫妻双方感情的问题,更是“新郎与新娘家庭间如何转移财产,进而塑造一个新家庭的过程”<sup>[6]354</sup>。除上文所述的拉伯齐娜不幸的第一次婚姻以外,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也能找出相似的例子。瓦西里·库拉金(V. Kuragin)公爵出于皮埃尔·别祖霍夫(P. Bezukhov)财产的原因,将自己的女儿海伦·库拉金(H. Kuragin)嫁给了皮埃尔,而从后面两者离婚的结局来看,海伦并不对皮埃尔抱有感情。而当他想让他小儿子阿纳托利·库拉金(A. Kuragin)赢取玛丽娅公爵小姐时,他更是露骨地表示:“替我安排好这件事,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奴仆,她门第好,又有钱,这就是我所需要的。”<sup>[14]8</sup>而即使是几大贵族家族中较为开放的罗斯托夫家族,当伯爵夫人听到自己的儿子尼古拉·罗斯托夫(N. Rostov)与自己的穷亲戚索尼娅·罗斯托夫(S. Rostova)相爱时,她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样会使他失去与名门贵族联姻的机会”<sup>[14]336</sup>;并在之后与儿子的交谈中当面称索尼娅是“女阴谋家”<sup>[14]595</sup>。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势利,对于罗斯托夫伯爵来说,他为自己没能经营好自身的产业而对儿子感到愧疚,不然“对于尼古拉来说,不会有比索尼娅更好的妻子了”<sup>[14]594</sup>。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上述对于童年问题的论述,托尔斯泰很有可能是在描述他的那个时代常见的婚嫁理念。因此,这种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婚姻观在《战争与和平》写作的19世纪中叶可能仍然在贵族家庭非常流行。最后,另一项常常被忽略的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来源于遗产的继承权,从19世纪初开始,俄国贵族家庭的父亲有权通过遗嘱将自己的财产与头衔交给任何人,而不局限于自己的血亲<sup>[15]</sup>。当然,这种自主支配自己遗产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也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的确从经济上很有效地控制了子女。

这种对子女从儿童时期到婚姻的高强度管理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近代早期俄国贵族家庭的内在“亲情上”的联系可能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托多洛夫就提出俄国家庭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的(家庭)关系随时可能因为恰当或不恰当的行为而建立或者终结<sup>[9]16</sup>。这种情况其实不难预测,对于孩子来说,父母对他的严格控制造成的结果是,子女对于父母感情更多来源于恐惧或者敬畏,而非亲情。谢尔盖·阿什科夫(S. Asakou)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他的祖父在邻里之间很有威望,对农奴也很和蔼。但当他在家中发怒的时候,他能够把所有的子女吓得躲到屋后的草丛中,而后第二天又装成没事人一样发号施令<sup>[6]</sup>。同时,18世纪末期,俄国贵族家庭中,父亲通常会离开家庭到军队或者政府履行职责,而贵族家的男孩通常会被送到专门的贵族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这种从小的疏远感造成相对于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更觉得和自己喜欢的老师或者同学更加像一个家庭;而这种分离式的家庭教育即使在叶卡捷琳娜颁布贵族解放条令之后也根本没有本质的改变,贵族通常会将子女交由家庭教师<sup>[16]295-301</sup>。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夫妻之间,由于父母包办婚姻,很多贵族家庭的夫妻并不能迈过感情这道坎。博洛托夫就在他的日记中抱怨:我对她(妻子)不能有任何爱抚和亲热的表示<sup>[5]260</sup>。

这种情况在进入19世纪开始逐步改变,如同上述妇女解放中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所起到的作用一样,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贵族家庭的改变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如同恩格尔(B. A. Engel)所描述的那样,最早对子女态度产生改变的几乎都来自于那些拥有留欧经历的贵族家庭,或者叶卡捷琳娜宫廷的近臣<sup>[9]45-46</sup>。相对于他们自己的父母,这些接受西方思想的贵族们更加注重自身对于子女的教育,并且斯巴达式的教育模式也大大减少。19世纪乡绅贵族安德烈一家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他们的家庭结构中,母亲娜塔莉亚·奇哈乔夫(N. Chikhacheva)负责庄园的事物管理,而作为丈夫的安德烈·奇哈乔夫(A. Chikhachev)则负担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务。在他儿子阿列克谢·奇哈乔夫(A. Chikhachev)的日记中,他父亲的教导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sup>[17]4</sup>。尽管略显严格,但这似乎可以说明他父亲对他教育的倾注程度,而不是像他18世纪的同僚一样将子女单纯地丢给学校和家庭教师。同时,相对于严格的斯巴达式教

育,安德烈公爵显然更加注重寓教于乐。他为了让子女们能够记住俄国的常用地名而发明了一个地图游戏<sup>[17]7-8</sup>。无论这种教育最后的效果如何,但能够注意到孩子们的乐趣并加以引导,则已经表明了他多少注意到了天性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19 世纪后半期,对子女表达人道主义关怀及建立伙伴关系,至少在舆论上是绝对正确的<sup>[5]262</sup>。

### 3 结 语

通过上述陈述可以发现,俄国贵族家庭的内部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这两个基本的家庭关系上,近代俄国贵族家庭的演变主线可以说是从专制向自由与平等模式的家庭关系过渡,直到 1917 年的大革命前,妻子相对于丈夫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子女的个性与尊严也逐渐得到尊重。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中,有些是俄国自身所特有的,比如贵族家庭的妇女相对于西欧的女性所拥有的财产继承权;有些是西欧文化带来的,比如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及叶卡捷琳娜大帝带来的德国宫廷风俗。因此,人们很难去界定到底是西方的思想还是俄国传统的文化在俄国贵族家庭的变迁史中起到了更多的作用。事实上,即使缺少了西欧思想的进入,俄国自身本土也有可能孕育出自由与平等的家庭模式变迁,毕竟在贵族妇女财产权的保证上,俄国远远优越于西欧各国。真正合理的表述可能正如 19 世纪中期的卡夫林所预测的一样,尽管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但最终俄国和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在近代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向了一致<sup>[8]86-87</sup>。

### 参考文献:

- [1] ROBINSON G.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 53.
- [2] 陶惠芬. 俄国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89.
- [3] 张建华. 俄国贵族阶层的起源,形成及其政治觉醒[J]. 理论学刊,2008(6):102.
- [4] FREEZE G. The soslovie (estate) paradigm and Russian social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6,91(1):12-13.
- [5]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上卷 [M]. 张广翔,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 [6] KAISER D H, MARKER G. Reinterpreting Russian History: Readings, 860—1860'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 [7] PERRIE M, LIEVEN D C B, SUNY R G. Women, The Family and Public Life[M]//PERRIE M, LIEVEN D C B, SUNY R 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WAGNER G W. Marriage, Property,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Russi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 [9] TOVROV J, DAVID L R. The Family in Imperial Russia: New Lin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M]. Urbana,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6.
- [10] MARRES M L. A Woman's Kingdom: Noblewomen and the Control of Property in Russia, 1700—1861[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108.
- [11] ENGEL B A.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 [12] 张绍彬. 近代俄国妇女和妇女解放运动[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13-14.
- [13] 屠格涅夫. 罗亭贵族之家[M]. 陆蠡,丽尼,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14]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上[M]. 刘辽逸,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15]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下卷[M]. 张广翔,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87.
- [16] RAEFF M. Home, school and service in the life of the 18th century Russian nobleman[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62,40(95): 295.
- [17] ANTONOVA K P. An Ordinary Marriage: Thee World of a Gentry Family in Provincial Russia[M/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015/04/15].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9796991.001.0001/acprof-9780199796991-chapter-08>.